

学人随笔丛书

衣鱼集



牧惠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衣鱼集

牧
惠
著

学人随笔丛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鱼集/牧惠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 8

(学人随笔丛书)

ISBN 7-80504-811-8

I. 衣... II. 牧... III. ①社会科学—杂文集②牧
惠—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035 号

学人随笔丛书

衣 鱼 集

牧 惠/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恒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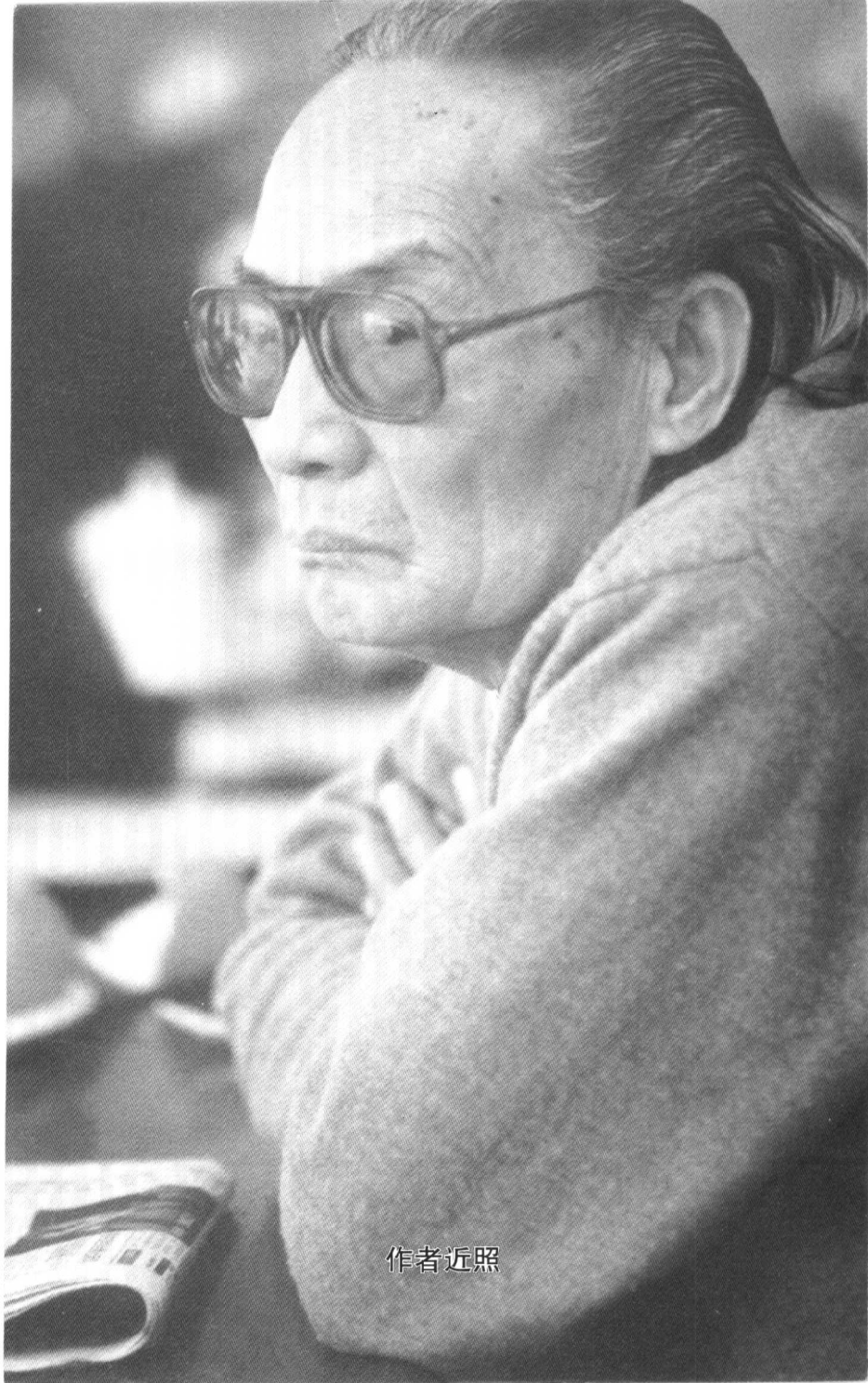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1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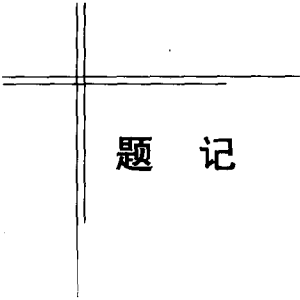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 7-80504-811-8

I·170 定价: 18.00 元



作者近照



题 记

王学泰先生命我编一本读书随笔之类的文集。这些年来，我主要的写作是针贬时弊的杂文，由于嗜书成癖，不时也写一些与政论性的杂文不一样的读书随笔或干脆就是文史小品。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羡慕黄裳先生，他竟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读那么多我无缘一读的好书。“文革”前，我有兴致不时地到琉璃厂、国子监去淘书，经历过“破四旧”，这种兴致大减。近两年，则连书市也懒得去凑热闹了。我能读到的，基本上都是大路货。由于读书范围的限制，这些文字的内容当然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同读者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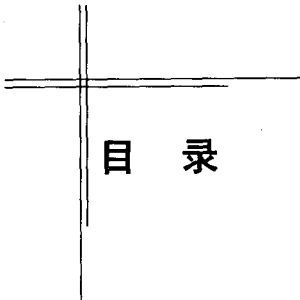
关于读书，粤语中有一些形象生动的词汇，读书又称为“Mei书”或“刨书”，特别入迷者，被称为“Mei家”。刨者，有如木匠刨木，使劲一

一页地“刨”过去也；这个“Mei”，我想借它比较接近原意而音译为“媚”，那意思则与全神贯注差不多。编这本书时，我曾想在“媚”、“刨”二字中找个书名，例如《媚书集》或《刨花集》之类吧。也终于觉得毕竟太局限于粤语区域而放弃，取蛀书虫的雅称“衣鱼”而定名为《衣鱼集》。

是为记。

2001.6.19

于且闲斋



目 录

题记.....	1
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1
蔽己与自蔽.....	7
“无差别境界”？.....	11
从五好家庭谈到“忍”字当头.....	15
贪钱必怕死.....	19
面面观.....	25
仪表的学问和代价.....	31
管闲事.....	36
略谈“三陪女”.....	41
开发君智.....	46
魏收·秦桧与修史.....	51
周奎心理.....	57
假冒皇帝.....	60
洪秀全“自惹而亡”.....	64
赦罪券的进步.....	72

想起了乌台诗案·····	75
伶人的“干预生活”·····	83
朱元璋删《孟子》·····	86
危素的尴尬·····	92
读《大义觉迷录》·····	96
查嗣庭与日记罪·····	101
响应号召罪·····	107
全民皆“广”·····	111
私刻上谕泄密罪·····	116
《档》外狱钩沉·····	119
自投文网·····	126
康熙·曹寅·张鹏翮·····	132
清代“反诗”作者考·····	137
坐轿与抬轿·····	140
寻事人·····	146
陈东的血痕·····	151
浴池内外·····	156
论“文死谏”·····	163
君子和而不同·····	171
“溜须”考·····	177
“族诛”小考·····	180
“誓书铁券”的由来及其他·····	185
学做梦·····	189
不值得做的梦·····	192
虎年谈灭鼠·····	196
灿烂的中国食文化·····	202

衣文化·····	206
考“黄”·····	211
“棍子”杂谈·····	218
拿鹅头·····	221
咬“咬艺”·····	226
新旧真假古董谈·····	232
奇砚·····	238
回龙汤故事·····	241
书三题·····	244
钱神絮语·····	252
人与狗·····	259
不合时宜的聪明·····	264
历史的颠倒·颠倒再颠倒·····	270
张说与吴兢·····	274
海瑞墓前的沉思·····	278
董其昌的毁誉·····	284
歌德的自由观·····	287
读《胡适的日记》二题·····	290
读书偶拾·····	296
自由、宽容及其他——读书札记·····	300
问题和主义·····	308
奴才·主子与人·····	314
“倒爷”西门庆的启示·····	321

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在书店随便翻翻中,发现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鸦片战争首先是琦善其人有与过去迥异的评价,于是买了回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十年时间搜集大量原始材料然后写出来的这本著作,论据可谓充分。一天同一位历史学家散步,我向他推荐这本书,告诉他茅海建不同意琦善卖国一说,却马上遭到拒绝,认为这是铁板钉钉不应当也不可以翻杂的结论。我不是历史学家,当然无法因此也不想说服他。只是从这番断然拒绝中进一步悟出:要改变一种被视为公理式的观念,确非易事。对鸦片战争和琦善的固定看法是这样,导致鸦片战争及其一切后果的观念,更是如此。

由此想到一句我们讲得也论得很滥的话:落后就要挨打。过去,一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只考虑经济实力即

生产力发展方面。读罢《天朝的崩溃》，这才深深地感到，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属于上层建筑方面落后，不仅也是挨打的原因之一，而且所占的地位并不一定比经济实力方面低，在某种条件下，甚至更重要一些。鸦片战争前后所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较量，以及这种较量终于以“天朝”的崩溃而告终，很能说明这一点。

“天朝”观念，首先就是由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优越感。这种把中国当成中心之国（类似后来的以我为核心之类）的历史传统，总是把中国之外的一切国家都视为“蛮”、“夷”，不能同中国平等对话的藩属。因此，中国同“四夷”的关系纯属“国内事务”，对它们要不是“剿”就是“抚”，根本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英国有如《水浒》里的梁山泊，要么派高俅、童贯们去剿，剿不了，就设法招安。

“天朝”观念，根本不承认市场经济的商业来往。包括比较开放、找了几位翻译专门给他搜集外国情报的林则徐和在内的官员和他们的皇上都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根本不必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而外国人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这类活命宝物，才会性命难保。于是，允许通商，同进贡其实是一回事，都是皇恩浩荡的证明，使“蛮夷”获利数倍的赏赐。取消通商乃是惩罚不驯分子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水平满可以同西方相抗衡，诸如此类的“天朝”观念使西方国家有如老鼠拖乌龟——无处入手的话，那么，到了1840年，拥有新式火药武器并对中国军队不仅装备而且体制都非常落后的内情有所了解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832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到中国考察之后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

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因此，这回英国是准备用枪炮来打开封闭着的大门的。

对于这一点，林则徐、龚自珍这些进步的人士，更休论那些对外国一无所知的庸才庸君，所持的观点大都是：一不信，二不怕。

林则徐于 1839 年 5 月 1 日曾如此判断收缴鸦片带来的情况：“到(广东)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痍之患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从寡之势，固不得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无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不肯舍此码头。”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英国人不敢打，不肯打；即使打，船坚炮利了不得在海洋占点上风，到了陆地就要不开了。不仅如此，这位努力致力于新知的林则徐，也坚信英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他甚至也说过英兵“一仆不能复起”这样的话。

诸如此类的剖析，传到道光皇帝那里，已经是一种误导。更要命的是，道光皇帝得到更多有意无意的假情报。

这种假情报，一是来自翻译。本来是英方照会中方，对林则徐的禁烟提出指控，而且要求赔偿包括被焚鸦片在内的经济损失，要求平等外交和割让岛屿、赔偿商欠和军费。翻译们却把它译成“情词恭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的“告御状”。办法是根本歪曲原文，把“抗议”译成“告明”，“赔偿”译成“昭雪”。另外一方面，还有那些昏庸无能的大官们为了对付皇帝而隐瞒真象，为了讨好皇帝而假报情况包括

硬说敌人如何“词意恭顺，尚属晓事”之类的谎言。

在这种既乏知己，更不知彼，观念远远落后于形势、远远有悖于事实的认识下，本来早应预料到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却是意外地发生了。事实证明，英方不仅敢打，而且能打；不仅在海上能战，在陆上也所向披靡，清方则溃不成军。1840年7月在定海之役败了。清皇朝并没有总结教训，提高认识，反而认为如果发生战争的地方不在定海而在早有准备的林则徐镇守的地方，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结局，认为在陆地上能打仗的只不过是“汉奸”而不是英兵。1841年7月在虎门之役又败，证明林则徐那一套同样不行，却又仍然不肯正视，把责任推给琦善。那结果是1841年8月厦门之役又败，……一仗一仗地败下去，毫无长进，反而增加了买马桶御炮、去关帝庙占签选定“四寅佳期”由寅年（虎年）出生的总兵带队来他个“五虎制敌”这类闹神闹鬼的笑话。

我们后来曾经有过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大炮的光荣战绩，但是，这种同仇敌忾的人民战争，根本不是把人民当作“盗贼”而加以防范的封建统治者所可能期望达到的境界。三元里的抗英运动，民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家而根本不是卫国。相反，被台风刮上小岛的“夷酋”义律、伯麦等20人，仅花了三千多元就得到村民的协助平安返回澳门，而奕山开出的赏价，仅仅义律一人就是10万元资金外加奏赏四品翎顶。可见民众对战争的麻木旁观。不止如此，两相比较，民众反而是怕清兵而不怕英兵。从陕川派到浙江参战的士兵“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干的是害民扰民的事。相反，倒是英兵从三元里得到教训，发布安民告示，甚至打开官府粮仓，散发给民众。于是，就难

免发生民众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利，帮助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类被称为汉奸的事情。当汉奸当然不是好事，但是，这只能是封建皇朝害怕民众而推选的专制和愚民政策带来的苦果。同时也是必然会挨打的政治体制落后的表现。

诸如此类的落后，还表现在战败之后签订条约时，一方面是力图在文字上捞回点面子，似乎仍然是堂堂大国在“恩准”对方这个那个，却由于根本不懂有关的常识而主动地送给英方接着还“以广圣主宽大之仁”而送给美、法等国家各种本来不应失去的主权。

1842年5月，接连碰壁的道光皇帝发下的一道谕旨，对奕经提出很耐人寻味的一连串问题：

著奕经等详细询(俘虏)以英吉利(以上三字均有口旁，排字困难从略，下同)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孟加拉(亦略去口旁)、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

……等等。

天纵圣明、无所不知的“天朝”“天子”，竟然提出一连串小学生的常识课理应回答得了的问题，不挨打才怪。可是，这还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进步呢！他终于觉得对外界所知太少了。

可惜的是，自高自大的封闭体系并没有因此被冲破，而是最多改变一下面目仍然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使清皇朝及其官员们认识到落后的不仅在船坚炮利方面（相反，来了明治维新），依然故我地“前面乌龟爬烂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几十年后，慈禧曾问大学士徐，我国所译外国书籍最好的有哪些，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西国枪炮固是制胜，若政教风俗，则远不及我国。所译之书，实荒诞不经也。”慈禧点头称：“吾亦云然。”（徐珂《清稗类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万岁万万岁。

慈禧死了，魂不散。另一位老佛爷炮制的诸如“蜗牛事件”，又是既非绝无仅有也不是最后的一桩“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的“佳话”。当然，挨打的形式到底有了些改变，倒是可以略堪告慰的。

蔽己与自蔽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很值得一读。这本书不仅总结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成就,而且对学风问题谈了一些很有益的见解。他谈到戴震时,对戴震提出的学问要坚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原则非常赞赏。他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涂,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已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一个人刚刚开始搞研究,很容易“为人蔽”。因为读书不多,所懂的太少太粗太浅,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读张三,觉得张三有理;读李四,觉得李四对头。发现不出他们之间的矛盾,或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又仍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于是,无所发现,无所发明,所写出的东西,不是来自张三,就是来自李四,或者是把张三李四捏合成一个矛盾百出的

“体系”。这就叫做“为人蔽”。

难得的是在研究一开始就坚持一种独立思考，对一切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怀疑一切”的精神。附带一句，“怀疑一切”并非坏字眼。马克思也说过的。它同“文革”时那种胡思乱想并非一回事，是一种严格的治学精神。戴震就是这样一个人。《戴东原墓志铭》中说到一件事：戴震十岁时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老师说：“此朱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答：“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答：“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答：“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老师被问得答不出话来。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是不为人所蔽的开始。有了这种精神，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取严格的分析批判态度，才可能有创造性。顾炎武也坚持这种精神。他在写《日知录》时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是个标准。他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也以这个标准衡量文人。他批评某人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依傍也者，就是为人所蔽。做诗，为杜甫所蔽；作文，为韩愈、欧阳修所蔽；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评价也很高：“无一语袭古人。”难得的是“无一语”！

梁启超自己也是采取这种治学态度。对于他的老师康有为，他既充分肯定老师的成就，又不客气地指出老师的不足。他指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某些论点“为事理之万不可通”。吾爱吾